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

第六十四本，第四分

出版日期：民國八十二年十二月

六朝吳語的層次

何 大 安

本文檢討傳世文獻資料，並參考前人論述，嘗試為六朝吳語的形成，分析其歷史來源。結論認為其中至少有四種語言層次：(1) 非漢語層，(2) 江東庶民層，(3) 江東文讀層，(4) 北方士庶層。文中並對各層的音韻特點作了重點式的說明。

將近六十年前，陳寅恪先生在《集刊》上發表了一篇題為〈東晉南朝之吳語〉的文章（陳寅恪 1936），提出了兩點主張。第一，「東晉南朝官吏接士人則用北語，庶人則用吳語，是士人皆北語階級，而庶人皆吳語階級」。第二，「東晉南朝疆域之內其士大夫無論屬於北籍，抑屬於吳籍，大抵操西晉末年洛陽近傍之方言」，而「吳之寒人既作典雅之韻語，亦必依仿勝流，同用北音，以冒充士族」；因此「今日東晉南朝士大夫以及寒人所遺傳之詩文雖篇什頗衆，卻不能據以研究東晉南朝吳音與北音異同及韻部分合諸問題也」。這篇文章與〈從史實論切韻〉、〈四聲三問〉、〈書魏書蕭衍傳後〉（陳寅恪 1949、1934、1958）等同為陳先生論六朝語言的名篇。陳先生雖然自謙「於音韻之學絕無通解」，但是他以中古史大師的煌煌巨眼，靈光獨照，卻往往能給音韻學家意想不到的啓發。

我個人從〈東晉南朝之吳語〉所學到的最大的教益，是當時的吳語區有兩種語體並存的這項歷史事實。用今天習用的辦法來說，就是當時的吳語區是個「雙讀」或「雙言」（diglossia）的社會。士大夫階級所使用的，是文化上的優勢語言，陳先生稱為「西晉末年的洛陽音」；而庶民階級所使用的，則是當地的吳語。從這樣的了解出發，我們自然就會想到這兩種語體本身有哪些語言學上的特

點，以及它們各自經歷過哪些發展的階段等等的問題。比方說，吳地之有士大夫階級，不自西晉末始。在那之前，當地士人的語言與西晉洛陽音有無差別？吳地庶民所操之吳語，自係一種漢語。但是吳地不盡為漢人所居，則此吳語之中有無融入其他民族語言成分之可能？這些問題，似乎都值得研究語言音韻的人再往深處去想。

六朝時期，包括三吳、金陵在內的江東之地，有許多「言語不同」的民族。《魏書·司馬叡傳》敘述東晉初立國時的民族情況時說：

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，若狐貉類云。巴、蜀、蠻、僚、貉、俚、楚、越，鳥聲禽呼，言語不同。猴、蛇、魚、鰲，嗜欲皆異。江山遼闊，將數千里。叡羈縻而已，未能制服其民。

陳寅恪先生〈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〉（1943）一文在解釋其中的「越」族時曾經說道：

伯起所謂越者，即陳承祚書之山越。凡《吳志》中山寇、山賊、山民及山帥等名詞，亦俱指此民族及其酋長而言。……東晉南朝史乘，雖極罕見此民之名，然其為潛伏混同於江左民族之中，仍為一有力之分子，則無疑也。

並且認為越「分佈於丹陽、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鄱陽諸郡之地」。這正是六朝史籍習稱為「吳」的地區。這個地區有「越」族。

六朝吳地的越族，當蒙戰國秦漢越人之名而來。早期越族所使用的語言為南亞語 (Norman and Mei 1976)，抑或是壯侗語 (韋慶穩 1981，鄭張尚芳 1990，Zheng-zhang 1991)，學者之間雖然還有爭論，但是以之為非漢語，基本的認定卻是相同的。晚到東漢末的鄭玄 (127-200 AD.)，在注《周禮》時還提到：「越人謂死為札」，「札」的語源也顯然不是漢語。至遲在東晉郭璞的《方言·注》裡，我們還可以看到：「今江東山夷呼虎為魑，音狗竇（之竇）」這樣的記載，表明山夷，即越，仍保有他們自己的民族語言。

但是《吳志》中又曾多次記載漢人政權對山越的征伐，並且納俘為部曲，編民為屯。這樣就必然會造成部分山越的漢化，而他們因此所操的漢語，也不可避

免地會帶有越語底層的影響。郭璞《方言·注》中有一條值得注意的材料：「今江東山越間，呼姊聲如市。此因字誤遂俗也」。這條資料的意思是說，因為一般人把「姊」字寫作「姉」，山越便據「姉」字而讀「姊」為「市」。山越的語言原來有沒有與「姊」字意義相當的詞，我們不得而知。但是如非郭璞指明，後人便無從辨識吳地「姊」之讀「市」並非漢語所固有。至於其他沒有明顯誤讀以至於不為郭璞所注意的語音改變，想來不會全無其例。那麼我們說六朝吳語之中有一些非漢語成分，應該是可以確定的第一點。

其次我們可以根據文獻材料，推測六朝江東庶民的一些語音特點。第一個特點是耕陽不分。相關的材料有以下三條：

《三國志·64·諸葛恪傳》：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諸葛恪，蘆葦單衣箴鉤落，於何相求成子閣¹」。成子閣者，反語石子岡也。建業南有長陵，葬者依焉。

《後漢書·28·徐登傳》：徐登者，閩中人也。……又趙炳，字公阿，東陽人，能為越方。……登年長，炳師事之。……後登物故，炳東入章安，百姓未之知也。炳乃故升茅屋，梧鼎而爨。主人見之驚懽，炳笑不應。既而爨孰，屋無損益。

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：吳郡陳遺，家至孝。母好食鑊底焦飯。

《三國志·諸葛恪傳》的一條，由於是反語，在語音的要求上格外精確，最具有代表性。這條反語以「成閣」反「石」字，以「閣成」反「岡」字。「閣」和「石」，「成」和「岡」的韻母非相同不可。「閣」和「石」上古同在魚部入聲，兩漢魏晉也同在鐸部。但是「成」和「岡」的韻母，自上古至魏晉卻都分屬「耕」、「陽」兩部（Ting 1975：245）。這表示在建業童謠中，「耕」、「

1 「閣」今本通作「閤」。「閤」，《廣韻》鐸韻「古落切」。「閤」，《廣韻》合韻「古沓切」。由於是與上文的「恪、落」押韻，這個字當以作「閣」為是。

「陽」是不分的。²

《世說新語·德行》中的「鐺」，無疑是一種炊具。可是「鐺」字《說文》、《廣韻》都釋作「鐺鐺」，可見作炊具解不是經典或通語的用法，而是吳地的方言詞彙。《後漢書·徐登傳》說趙炳「升茅屋，梧鼎而爨」，以驚動百姓，那麼鼎非禮器，而是當地民間常用的炊具。章安、東阿都在今浙東、浙南，屬於吳地。「鐺」極可能就是當地人呼「鼎」的一種轉語。「鼎」、「鐺」自上古至魏晉，分屬耕、陽兩部（Ting 1975：245）。同名異呼，反映了耕陽合流的特點。

第二個特點是《廣韻》齊、仙不分。主要的根據是下面這一條資料：

《爾雅·釋言》：「劑、剪，齊也」。《注》：「南方人呼剪刀爲劑刀。」

郭璞《爾雅·注》的「南方」，一般是通指江東、荆楚而言的；包括了吳地在內。呼「剪」爲「劑」，是將《廣韻》仙韻系的字讀成齊韻系。今天的吳語方言還保留這個特點，兩韻系都讀成前高元音。我們贊同張琨先生（1985）的意見，認爲這是從東晉郭璞時代就已經有的一種語音特色。

第三個特點是《廣韻》的監、元不分。《晉書·28·五行志》記載：

義熙二年，小兒相逢於道，輒舉其兩手曰：「盧健健」。次曰：「鬥歎，鬥歎」。末曰：「翁年老，翁年老」。當時莫知所謂。其後盧龍內逼，舟艦蓋川，「健健」之謂也。既至查浦，屢剋期欲與官鬥，「鬥歎」之應也。「翁年老」，群公有期頤之慶，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。

其中以「健」爲「艦」。「健」是《廣韻》元韻三等去聲群母字，「艦」是監韻二等去聲見母字。元韻系字有-n尾，監韻系字有-m尾。在今天的一些吳語方言中，元韻系、監韻系字的鼻音尾都已失去，元音也高化爲前高或半高元音。

2 這首童謠，《晉書·五行志》引其中的「成子闇」作「常子闇」。「常」在陽韻，自上古至魏晉都一直與「岡」同在陽部。如果根據這個本子，那麼「常」、「岡」同部，就不是「耕陽不分」了。不過《晉書》晚出，成於唐人之手。後人在編集流傳的史料的時候，把不合編集者當時語音習慣的字加以改易，這種可能性比較大。所以我們還是採用較早而不合唐人音韻習慣的本子。

「健」、「監」和「剪」、「劑」雖然在《廣韻》中分別都有不止一處的聲韻差異，但是「以健爲鑑」和「呼剪刀爲劑刀」所反映的最主要的語音現象，恐怕都在某些韻的鼻音尾丟失這一點上。

根據丁邦新師的研究(Ting 1975)，魏晉時期的詩文押韻，不論是北方，或是包括江東在內的南方，「耕」、「陽」都是兩個不同的韻部；包括齊韻系字在內的「皆」部，和包括仙韻系字在內的「元」部，也是兩個不同的韻部；監韻所屬的「談」部，和元韻所屬的「元」部，也不容相混。可是上引的資料，卻把詩韻有別的韻部都混同了。這些資料或爲童謠，或涉及「鼎、鑑」、「剪刀」之類的日常用具，反映的是庶民階級的文化。因此文士有別而庶民不別的這三項特點，可以顯示至少一種漢語方言層的存在。我們不妨暫時稱之爲「江東庶民層」。

再其次，我們可以推想還有一層「江東文讀層」的存在。江東士族既非始自東晉，其宦學所習，必定早有所本。丁邦新師曾指出魏晉時期吳地詩韻有下列五項特點(Ting 1975:263-264)：

1. 支、脂兩部相混
2. 幽、宵兩部接近
3. 魚部中的魚、虞兩韻有別
4. 去、入兩聲分別甚嚴
5. 東、冬兩部合流

這些特點主要反映在西晉時期的吳地詩文押韻中，作者包括了陸機、陸雲、韋昭、楊方、孫皓等人。這個時期，西晉洛陽近傍之方音尚未隨王室南渡。上述這些特點既與同時代的其他地區詩韻表現不同，自應視爲吳地自秦漢以來漸次形成的江東文讀層的反映。梅祖麟先生(1992)曾就魚虞問題指出：六朝洛陽音魚虞混，金陵音魚虞分。其間金陵音雖受到北方魚虞不分的影響，但是魚虞分的痕跡，直到今天的吳、閩方言還有所存留。這一點尤足爲江東文讀不同於西晉末年洛陽音之証。

最後，當然還要加上陳寅恪先生論之已詳的南渡北語，也就是西晉末年的洛陽音。這種南渡北語，可能原來並沒有明顯的士庶之分，因為詩韻、民謠和相關文獻所顯示的差異不大。倒是反而有像顏之推所說「隔垣而聽其語，北方朝野終日難分」之類的記載。這樣的北語，我們可以稱為「北方士庶層」。這一層就其來源於西晉末洛陽音而言，自是不同於江東庶民或江東文讀。而在經歷了兩百多年的相互影響之後，六朝後期的南渡北語，其面目亦當與西晉末不同。試比較魏晉和南北朝詩韻的韻部分合(Ting 1975，周祖謨 1988 a、b、c，何大安 1981)，就看得十分明白。

這樣我們就為六朝吳語從來源上分析出四種層次：(1) 非漢語層，(2) 江東庶民層，(3) 江東文讀層，(4) 北方士庶層。陳先生說「士人皆北語階級，而庶人皆吳語階級」，這是一種社會語言學的觀察。我們所說的四種層次，則是一種歷史語言學的觀察。理論上說，一個語言社群中的不同語體，可以同屬一個語言或方言系統；這個時候各語體間的差異可能在於詞彙的選擇，或是語用上不同風格的呈現。不同的語體，也可能不屬於同一個語言；這個時候各語體間的差異就是系統上的，差異大的甚至不能交談。東晉南朝吳語中的兩種語體，一為土著吳語，一為南渡北音，系統上並不相同。南渡北音，也就是北方士庶層的負載者。就共時的平面而言，這一層集中在士人階級。但是前文已經說過，士人階級原來就有江東文讀層的一面。所以士人階級也有北方士庶和江東文讀兩系統的並存。這兩種系統的交融，產生了後來大部分為《切韻》所本而為唐人批評的「吳音」。我們不能確知隋唐以後吳地是不是還有明顯的士庶語言之分，但是從長時距來看，說這個地區歷史上有過四種層次的語言特點在作用著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(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十九日通過刊登)

引用書目

- |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《周禮·注》 | 漢·鄭玄 | 嘉慶南昌府學《十三經注疏》本 |
| 《爾雅·注》 | 晉·郭璞 | 嘉慶南昌府學《十三經注疏》本 |
| 《方言·注》 | 晉·郭璞 | 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戴震疏證本 |
| 《三國志》 | 晉·陳壽 |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|
| 《後漢書》 | 宋·范曄 |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|
| 《世說新語》 | 宋·劉義慶 | 香港中文大學楊勇校箋本 |
| 《魏書》 | 齊·魏收 |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|
| 《晉書》 | 唐·太宗（李世民） |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|
| 《廣韻》 | 宋·陳彭年 | 康熙澤存堂張士俊重刊本 |
-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|
| 何大安 | 1981 | 《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，國立台灣大學博士論文。 |
| 周祖謨 | 1988a | 〈魏晉音與齊梁音〉，見於所著《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》：69-79；1988，杭州，浙江古籍出版社。 |
| | 1988b | 〈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研究〉，前引書：100-138。 |
| | 1988c | 〈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的研究〉，前引書：139-168。 |
| 韋慶穩 | 1981 | 〈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〉，《民族語文論集》：23-46；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 |
| 陳寅恪 | 1934 | 〈四聲三問〉，《清華學報》9.2：275-288。 |
| | 1936 | 〈東晉南朝之吳語〉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7.1：1-4。 |
| | 1943 | 〈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〉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11.1：1-25。 |
| | 1949 | 〈從史實論切韻〉，《嶺南學報》9：1-18。 |
| | 1958 | 〈書魏書蕭衍傳後〉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1：79-80。 |
| 梅祖麟 | 1922 | 〈蘇州方言以及其他蘇南吳語裡的魚虞之別〉，未刊稿。 |

何 大 安

張 琨 1985 〈論吳語方言〉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56.2：215-260。

鄭張尙芳 1990 〈古吳越地名中的侗台語成分〉，《民族語文》6：16-18。

Norman, Jerry and Tsu-lin Mei

1976 〈The Austroasiatics in Ancient South China〉,
《Monumenta Serica》32：274-301。

Ting, Pang-hsin (丁邦新)

1975 《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-Chin Period: Reconstruction
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》，歷史語言研究所專
刊之65；台北，中央研究院。

Zheng-zhang, Shang-fang (鄭張尙芳)

1991 〈Decipherment of Yue-Ren-Ge〉，《Cahiers de
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》20. 2：159-168。

後 記

本文屬稿之前，曾向梅祖麟先生請益，得其啓發；初稿並承李壬癸師誨正，謹此一併申謝。壬癸師另有兩點教示，簡誌如下，以代書紳。

一、從目前的漢語音韻史的知識來衡量，六朝時期江東庶民層與江東文讀層的音韻差異頗大，而江東文讀層相對地卻較接近北方士庶層。這三種語言層間彼此接近的程度，可以圖示如下：



二、江東地方士大夫階層的語言（江東文讀層）與同一地區的庶民語言（江東庶民層）差距頗大，反而和文化中心的北方士庶語言（北方士庶層）更為接近。這反映了一種社會語言學上「階級差距遠大於地區差距」的現象。這種現象也見於印度南部達羅毗荼語 (Dravidian) 的一種方言，讀者可以參看 Peter Trudgill 所著《Sociolinguistics: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》頁 36（1983 年修訂版，London, Penguin Books Ltd.）。